

XINJIAPPOZHONGGUO
TUIGUANG
PUTONGHUABIJIAOYANJIU

新加坡/中国 推广普通话比较研究

XINJIAPPOZHONGGUO
TUIGUANGPUTONGHUABIJIAOYANJIU

汤云航 吴丽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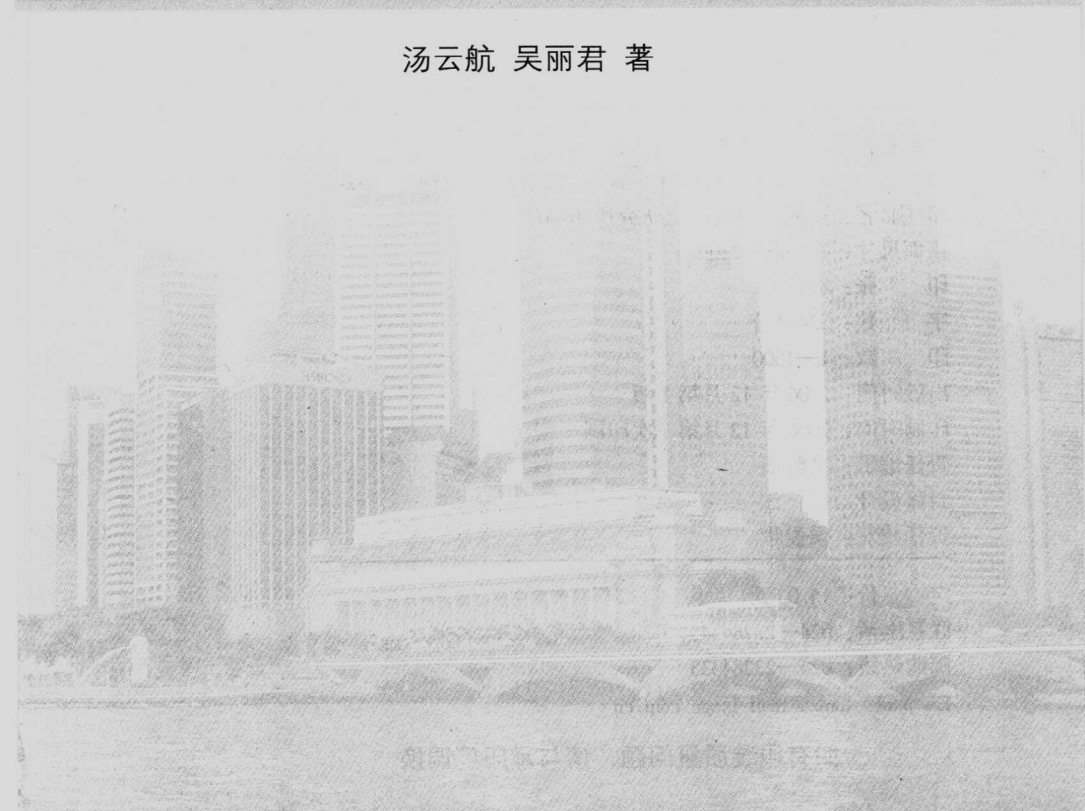


辽宁民族出版社

新加坡/中国
推广普通话比较研究

XINJIAPPOZHONGGUO
TUIGUANGPUTONGHUABIJIAOYANJIU

汤云航 吴丽君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总 序

教材建设是高等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质量人才的基本保证,也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保证。为加强学校的教材建设,2005年我校重新修订了《承德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材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了教材立项、编写、资助、出版、奖励等有关规定,激励广大教师多编书、编好书、出好书。提出了“提倡教师编写具有本校优势和地方特色的高质量教材,建立起以国家规划教材的使用为重点,特色鲜明的自编出版教材为补充的学校教材建设与管理机制”的指导思想,注重编写具有我校优势和特色的教材。依据这个指导思想,在学校领导大力支持和广大教师的积极参与下,我们以人才培养目标和社会对人才需要为依据,在继承原有教材建设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校教学改革、专业建设和科学研究的实际,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的教材开发工作。我们这次优先出版的教材遵循这样的原则,一是反映教学改革的成果,能正确把握新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方向,在选择教材内容和编写体系时注意体现素质教育思想,注重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为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创造条件;二是重点放在重点课程、主干课程、有优势和特色的学科专业的教材及辅助教材上;三是体现学校办学特色的校本教材,能反映地方特色、区域文化的教材。在此原则指导下,各系部积极组织申报各级各类规划教材的立项,经系部教材工作领导小组推荐,校教材工作委员会评审后,确定首批共12部有优势、有特色、有创新的教材,学校在条件和经费上将优先给予安排和支持。这12本教材是《简明满语教程》《民族概论》《宗教与宗教学略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教程》《承德历

史与旅游》《承德地理》《承德生物资源》《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碑文解读》《新加坡/中国推广普通话比较研究》《实施音乐新课程标准教学指导》《汉语基础教程》《汉字文化导论》。这些教材充分发挥了学校的资源优势，体现了地方特色和学校的办学理念。

目前，我校正处在由专科层次改建成多学科性民族本科院校的关键时期，这批由学术水平较高、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编写的教材的出版，不但对我校教材建设起到积极指导和推动作用，体现了我校教师思想水平、学术水平、教学水平以及编写的组织能力，而且对促进学校专科升入本科、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绪 论

不管语言是上帝的赐予还是人类自己的创造,从它降临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既对人类的语群内交际打开了方便之门,又对人类的语群外交往设置了囚禁的壁垒。人们一方面在自己的语群内自由地使用着祖先传承下来的语言,顺畅地袒露心扉和彼此交谈,另一方面又身陷在自己语言的“家”里,遭到自己语言的围困和隔绝,成为语言囚徒。在多语(多方言)的国度里,出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也就是语族或语群之间交际的需要,语言囚徒的语言突围既成为个体对自身生存与生命意义扩展的追求,又成为社会与国家打破语族方言隔膜、构建国家社会整体文化的努力。正是由于语言生命的突围,语言存在的敞开,语言文化的建构,形成了人类语言社会异彩纷呈、和而不同、共生共处的语言文化奇观,新加坡和中国推广华语(普通话)的历史就是语言文化奇观中的奇葩。

新加坡和中国,两个不同的国家,基于各自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的需要,都在以基本相同的方式开展推广同一种语言——普通话(华语)的社会工程。在新加坡和中国,推广华语(普通话)都有悠久的历史,其前奏曲大致都肇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由切音字运动导源的国语运动。其正式开始时间虽然前后不一,但也大致趋同,都是开始于独立建国之后。中国内地是以1956年1月28日成立的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和2月6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为标志,揭开了规模宏大的推广普通话活动的序幕,尤以1998年开始的每年9月份第三周的“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为其活动的表征。新加坡推广华语一般都认为是开始于1979年9月7日的每年一个月的“全国推广华语运动”月,

但我们认为,新加坡推广华语其实开始于正式明确提出和实施双语教育的1966年,其后的“推广华语运动”只不过是它的重要表征和集中的推动形式。由于坚持广泛而持久地推广华语(普通话),新中两国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据国家语委“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课题组2004年12月公布,普通话在全国的普及率达到53%,其中城镇普及率达66%,乡村普及率达45%^①。新加坡推广华语的成效更是有口皆碑,早在1989年,李光耀对推广十年的华语运动的总结就是:“新加坡华人现在都接受华语为家庭和社交语言。”可以说,中新两国推广华语是世界不同国家语言规划的成功范例。描述他们的发展进程,归纳他们的基本做法,反思他们的经验教训,概括出具有一般意义的范式,对于社会语言学中的语言规划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对于两国取长补短,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继续推广华语(普通话)也不无裨益。

一、共同语的正名

中新两国分别推广的共同语,在中国内地,叫做普通话;在新加坡,叫做华语;在台湾,叫做国语。这三个名称是名异实同还是名异实异?是应该统一称为普通话,还是统一称为华语或是国语?学界意见并不一致。因为本文关注的重点不在它们的名实之辨,所以不予展开讨论。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汉民族共同语所形成的普通话、华语、国语三个称谓,是历史、现实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是不同区域相沿成俗的既成事实,在外在因素没有或不能改变的条件下,无论是基于何种理由,强行或提倡三中选一或另造新的称谓都难以被各地民众所接受和认同。现实和理性的做法不是求同而是存异,各地依据习惯分别表述而又相互认同。事实上目前和可以预见的将来,各地民众实际上也是这样理解和使用的。

^① 陈章太:《论语言规划的基本原则》,载《语言科学》2005年第2期;又被收入《语言规划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1月版。

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也是中国国家的通用语言。其定义是：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新加坡华语是新加坡华族的共同语，它是在新加坡的土壤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区域变体。”^①

简而言之，普通话是汉民族的共同语，也是中国国家的通用语言。新加坡华语是新加坡华族的共同语，是普通话的区域变体。两者无论是外延还是内涵都是相同的，虽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新加坡华语中特有的词汇。因此，中国的普通话与新加坡的华语其内涵是一致的，只是由于区域不同，相沿成俗，分别称为普通话和华语。

二、性质的认定

中国的推广普通话与新加坡的推广华语，都是政府推动的、旨在推广国内最大民族共同语的长期社会语言建设工程。它们的性质集中体现在：第一，都是政府行为，而不是民间的自发活动。第二，推广的都是国内最大民族的共同语，而且都是官方语言。普通话是中国国家的通用语言，也是事实上的国语；华语虽然不是新加坡的国语，但也是官方语言之一。第三，两国都有悠久的推广历史，而且也都希望通过短时的密集造势、多管齐下，以达到共同语普及的长期效果。第四，由于目标的艰巨使它们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具有长期性。第五，它们都是涉及面极为广泛的社会活动，而不是局限于某一领域或某些部门的局部行为。第六，两国的推广共同语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当然，也暴露出一些相同或不同的问题。因此，中国的推广普通话与新加坡的推广华语具有相同的属性。

基于以上的认识与理解，中国的推广普通话与新加坡的推广华语就具有了可比性，这也就是我们进行比较研究的起点。

^① 汪惠迪：《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探微》，载周清海等著《新加坡华语词汇与语法》第27页，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2年9月版。

三、本书的写法

为便于比较与阅读，本文采取由研究起点出发的双线先分后合式的布局 and 写法，即确定研究起点之后，先是两条线单独分别进行，然后是合而为一，进行综合分析。在章节安排上，是由“面”及“点”，“点”“面”结合。首先是全面梳理新中两国推广华语（普通话）的历史发展脉络，使读者对新中两国推广华语（普通话）具有宏观上的了解和把握；然后是对在两国推广华语（普通话）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重点管道进行详细介绍与描述，如新加坡的华文教育、中国的普通话水平测试，以使研究宏观脉络清晰，微观重点凸显。本书各章节互相照应，实为一体，但更注重独立系统成章。这样安排，是为读者着想，可以根据需要，既可以面面俱到，也可以各取所需。

目 录

绪 论

第一章 新加坡的语言政策与官方语言的地位和功能

- 第一节 新加坡的语言政策 2

- 第二节 新加坡官方语言的地位和功能 7

第二章 新加坡推广华语的进程与管轨

- 第一节 民间推广华语——华文教育单轨运行推广时期 22

- 第二节 政府推广华语——华文教学与华语运动双轨并行推广
时期 30

第三章 从华文教育到华文教学

——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发展、衰落与再生

- 第一节 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历史分期 67

- 第二节 华文教育的发展与衰落 69

- 第三节 华文教学的再生与发展 84

- 第四节 对新加坡华文教育发展、衰落与再生的思考 90

第四章 中国推广普通话的历史进程

- 第一节 历史上的推广民族共同语活动 101

-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 107

- 第三节 中国内地的推广普通话 116

第五章 普通话水平测试

- 第一节 普通话水平测试概说 130

- 第二节 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 133

第三节	普通话水平测试中语音错误与缺陷的评判	135
第四节	普通话水平测试流程与应试准备	141
第五节	单音节字词测试	143
第六节	多音节词语测试	145
第七节	朗读短文测试	149
第八节	命题说话测试	151
第六章 新加坡/中国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启示		
第一节	宏观协调——妥善处理各种关系	156
第二节	避免边缘化——对个人的警示	166
附录一	《河北省普通话水平测试用词语表》中非常 用字表	169
附录二	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容易误读的双音节词语表	179
附录三	普通话水平测试用必读轻声词表	185
附录四	普通话中“重·次轻”格式词表	189
附录五	普通话水平测试用双音节儿化词表	192
附录六	河北省普通话水平测试用朗读作品（1—40号）	194
附录七	河北省普通话水平测试用话题（1—40）	241
主要参考文献		243
后 记		246

第一章

新加坡的语言政策与官方语言的 地位和功能

新加坡的语言社会是人类语言的“博物院”，同时也是同一种语言不同方言的“陈列馆”。新加坡政府对背靠世界三大悠久文化传统——中华文化、马来文化、印度文化的华族、马来族、印度族所使用的不同语言的规划与调理，对新加坡社会整体语言文化的建构，是复杂而危险的，同时也是成功和值得骄傲的，其成就的可圈可点已为世人所称许。新加坡政府的语言政策的制订与实施是多语国家语言规划的成功范例，同时也是多方言国家和地区推广民族共同语的典范。

新加坡语言政策可以分为英国殖民时期的“独尊英语，放开其他”、独立前后的“独尊巫语，多语并重”和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多语并存，英语独尊”三个发展阶段。目前其语言政策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尊重国内各种族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多语政策来谋求文化传承、民族和谐与政治稳定；以英语的通用作为掌握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利器，推动经济繁荣和国际沟通，冀求建立对国家的忠心和认同。在这样的语言政策的制约和影响下，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和英语四种官方语言的地位和功能呈现出明显的分工并存态势：马来语是名义上的国语，是马来人的共同语，是各种族之

间的底层通用语言；华语是华族的民族共同语，是华族社群的高层语言；淡米尔语是印度族的通用语言；英语是实际上的国语，是社会的顶层语言，也是各种族之间的通用语言。

第一节 新加坡的语言政策

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多语言的国家，语言政策在其国家的整体政策中始终占据突出的位置。随着社会的发展，其语言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考察新加坡的语言政策，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英国殖民时期的“独尊英语，放开其他”

新加坡的历史如果从 12—13 世纪美丽的狮城传说开始，当然也是很悠久的。但是，人们一般是把 1819 年莱佛士的开埠视为近代新加坡的开端。从此以后，除了 1942 年 2 月 15 日—1945 年 9 月 5 日被日军占领外，一直到 1959 年 5 月自治邦成立之前，新加坡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

在整个殖民地时期，由于各种族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楚河汉界，互不侵犯，仅仅是保持着浮面的接触，因此，殖民政府为方便殖民统治，其语言政策是“独尊英语，放开其他”。其特点是：凡是与政府施政有关的立法、行政、公告、文书等均以英语进行，英语成为事实上的唯一官方语言；与此同时，面对不同种族语言、不同方言杂陈的移民社会，殖民政府在独尊英语的同时，抱着开放与容忍的态度对待其他语言，其他语言可以放任自流。其结果是，形成了社会语言的两大层面：上层语言是英语；下层语言是不同种族的语言和方言。这种语言政策直接导致教育语言和传媒语言的泾渭分明：依靠民间力量兴办的不同语言源流的学校并存，以不同语文发行的报纸刊物并见。在两大社会语言层面之间，虽然不乏兼通英语和其他民族语言的少数人，而成为殖民统治者和其他民族人士之间的“中间人”，但人数毕竟有限，只能称之为沟通的“使者”。

殖民历史和英语独尊的语言政策为新加坡以后的语言政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它给新加坡留下的一笔重要财富就是它的行政语言——英语。后来英语之所以成为官方语言之一，成为事实上的国语，主要就是延续了英国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

二、独立前后的“独尊巫语，多语并重”

二战以后，争取自治独立的浪潮席卷亚非殖民地区。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下，也开始了争取自治独立的政治努力。在当时，出于生存与政治策略的考虑，领导层以谋求跟当时的马来亚联邦合并，成立马来西亚联邦，作为新加坡政治发展的目标。在语言政策方面也采取了相应的决定，这就是“独尊巫语，多语并重”的语言政策，亦即以马来语为“跨种族共同语”——“国语”，同时尊重其他语言的存在和发展机会的多语政策。人民行动党曾明确宣示：“我们需要有一个通用语，而基于道德上、政治上和实用上的考虑，马来语（而非英语）乃是一显然的选择。”^① 1959 年，当时的副总理吴庆瑞博士也明确提出：“我们希望在未来的社会里，群体之间没有隔阂。人们不会再居留于相互孤立的群体之中。我们将会有一种共同的语言——马来语——作为自由沟通的工具。”^② 1959 年，自治邦宪法宣布马来语为“国语”。政府当局采取各种措施提高马来语的地位并积极予以推广，如规定在政府学校的教师须具有第一级马来语程度，公务员须具有第二级马来语程度，以及推行“国语月”、“国语周”运动等。这一语文政策甚至延续到新加坡 1965 年 8 月 9 日脱离马来西亚联邦完全独立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这既是语言政策的惯性使然，更主要的原因是当时许多人仍然认为独立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新加坡没有独立生存的条件，在未来适当的情况下，谋求与马来西亚的合并仍然是不可避免的选择。

对于这一时期的语言政策，郭振羽曾概括为是“以马来语为主的

①② 转引自郭振羽：《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第 107 页，台湾：正中书局 1985 年 5 月版。

多语政策”，他说：“在推行并加强马来语文之际，新加坡政府在教育方面仍然坚持四种语文源流学校平等并重的政策。换言之，这段时期的语言政策乃是以马来语为主的多语政策，而希望以此为基础建立国家意识，以求统一。”^①

从前一阶段的“独尊英语”改变为“独尊巫语”是时势的必然，是与争取自治与独立、尤其是争取与马来亚合并的政治目标相一致的。正如 1959 年人民行动党所出版的“五年计划书”所说的：“以马来语为国语，与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的建议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学习马来语文，不但可以（使马来语）成为沟通四种语言源流学校的桥梁，而且可以帮助我们跨过柔佛海峡，加入马来亚联邦。”^②

但是，从前一阶段的“独尊英语，放开其他”到“独尊巫语，多语并重”，虽然性质上还是多语政策，但此时的时势已经与殖民地时代大不相同。在殖民地时期，移民们是客居他乡，终要衣锦还乡落叶归根，因此，殖民政府的语言政策虽然是明显的不平等，也损伤了民族感情，但终究是客居他乡，似乎与自身还隔着一层，所以并不是十分关注与在意。而此时，移民们的本地意识明显增强，新的国家意识与国家认同已经萌生或建立，而新的国家语言政策将不仅关系到他们的民族认同与民族感情，更直接影响到他们在未来国家中的地位乃至生存和发展；同时，前一阶段独尊的英语并不是新的国家里的某一主体民族的语文，而是一种超乎其上的“中立”语言，而此时让国内的某一民族的语言来“同化”其他民族语言或“使之具有超乎其他语文之上，无可争辩的优先地位”的急功近利的语言政策，打破了原来的各主体民族语言相对平等的格局，语言地位的失衡自然会唤起民族感情和对民族地位的担忧，也就自然会引引起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尤其是华文教育背景者的反感。同时，由于新马的分离以及新加坡分离后政治经济情势的欣欣向荣，预示着这种分离不会是暂时的，因此，在

①② 转引自郭振羽：《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第 107 页，台湾：正中书局 1985 年 5 月版。

这种政治情势下,大约以1967年“国语宣传周”活动的停止举办为标志,新加坡的语言政策在有形无形之中悄然开始了转变。

这一时期语言政策的调整是时势的必然,但随着时势的变化,也使得这一时期的语言政策成为新加坡语言政策规划史上短暂的过渡阶段。李光耀后来也承认在独立之后还坚持这样的政策,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渡策略。他说:“1965年(独立年)我们做了非做不可的重大决定。不过我们决定循序渐进,而不是突然的决定:‘好,从现在起英文是工作语言,同时我们也学习母语。’我想那必然引起暴乱。华人绝不会接受这样的决定。于是我们说:‘我们维持现状,别更改。不过家长可以自行做选择,要送你的孩子进入华文学校,学习英文(作为第二语文),或者进入英文学校,同时学习华文或者马来文或者他们选择的任何语文;或者进入马来学校,同时学习英文;或者进入淡米尔文学校,同时学习英文。’制订这样的政策,我们知道过了一段时间,英文将成为工作语文,各族的共同语文。结果,果然如此。家长当然会为孩子选择一种能给孩子的一生带来有用知识的语文……假定我们当时说:‘大家都只念英文。因为那是新加坡人的工作语文。’我想我们必定会有很大的麻烦。”^①

这一阶段语言政策的最大贡献,就是奠定了马来语在新加坡的国语地位,同时以家长自由选择的策略,实现了实际国语地位悄然的平稳转移。

三、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多语并存,英语独尊”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李光耀在当天的电视记者招待会上宣告:“新加坡要建立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我们将建立个榜样。这不是个马来国,这不是个华人国,也不是个印度国。让我们真正的新加坡人,……不论种族、语言、文化、宗教,团结一致。”^②同年10月1日,总理公署发表文告,正式确立了共和国

^① Han Fook Kwang, Warren Fernandez & Sumiko Tan, Lee Kuan Yew: The Man And His Ideas (Singapore: Times Editions, 1998), 134.

^② 《星洲日报》,1965年8月10日。

的语言政策：在新加坡，四种官方语文——即马来文、华文、淡米尔文和英文——都是同等地位的官方语文。马来文是我们的共通语文，它是我们的国语。……四种语文，在新加坡都成为官方语文，是因为这是对的，而于我们国家和人民都有裨益。……新加坡的宪法将重新规定各语文向来所享有的地位，即新加坡有着四种官方语文……而以马来文作为共通语文和国语^①。

从所宣布的语言政策看，在独立之初，基本上还是承续了前一阶段的“独尊巫语，多语并重”。但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情况显示，新加坡的独立在当时虽然是无奈的选择，但并非暂时性的权宜之计，甚至是一个英明的决定。新加坡不但具有独立存在的能力，甚至还能繁荣强大起来。在此情形下，独立前后，以马来语为主的多语政策开始发生逐步的转变，从70年代初期开始，新一阶段的语文政策逐渐定型，这就是“多语并存，英语独尊”。大致包括以下几点：

1. 马来语、英语、华语、淡米尔语四种官方语言并存。
2. 马来语是国语，但只有国语之名，而无国语之实。
3. 英语是工作语言，具有国语的实际地位。
4. 教育上实行双语政策，各民族学生均必须学习英语，作为共同语言。前期一般是母语（第一语文）+ 英语（第二语文）；1987年以后是英语（第一语文）+ 母语（第二语文）。
5. 各民族学生，均须学习其本民族的语言，作为保留传统文化价值的媒介。
6. 推广华语，使华语成为华族的共同语。

其基本精神是：尊重国内各种族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多语政策来谋求文化传承、民族和谐与政治稳定；以英语的通用来掌握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利器，推动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冀求建立对国家的忠心和认同。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将会延续下去。

^① 《星州日报》，1965年10月2日。

第二节 新加坡官方语言的地位和功能

语言政策的制订,尤其是语言地位的规划,虽然与语言本体有关系,但主要是受语言之外的因素制约,或者说,语言政策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语言的政治、历史、经济、文化等因素;同时,语言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也必然会对不同语言的社会地位和功能产生影响。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多种语言并存的国家,由于语言联结民族感情、民族认同和民族文化,事关种族和谐,国家稳定,所以,在新加坡,语言问题始终是个十分敏感的话题。语言政策是新加坡国家整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生存、稳定与发展始终是它制订语言政策考量的标准。李光耀曾经明确地说:“无论是好是坏,我们是在东南亚,而且永远不能离开这个地方。我们所制订的政策,就是为了要确保我们跟邻国在东南亚地方和睦共处,但有权在自己的家园当家做主。任何活动,任何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原则为准绳。”^①因此,新加坡的语言政策的制订、实施与发展,是非语言因素影响和左右语言政策的典型个案。

新加坡的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和英语,都是官方语言,在名义上具有平等的地位,主要表现在:四种语言均是官方语言;在国会的讨论和辩论中,国会议员可以使用任何一种官方语言,国会提供即席同声翻译;四种语言都是教育语言。但是,在实际的社会语言生活中,四种官方语言却出现明显的地位差异与功能分化。

一、马来语的地位与功能

马来语是新加坡的国语,其法律地位高于其他官方语言。马来语贵为国语,主要是历史和地缘政治因素决定的。

从历史因素看,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新加坡争取自治与独立运动的政治目标是与马来亚合并,成为马来西亚联邦的一员。为与这一

^① 《南洋商报》,1965年12月14日。